

第四届湘鄂赣苏 区论坛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目 录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奋力开创原湘鄂赣苏区

发展新局面	谢亦森/1
关于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蒋建农/6
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的致辞	张素华/17
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的致辞	谢来发/20
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的致辞	罗光荣/22
让湘鄂赣苏区绽放党史惠民之花	张志初/24
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的发言	张帆/31
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的发言	彭勃/34
湘鄂赣苏区的重大历史贡献及几点思考	齐德学/40
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上的发言	王晓春/47
湘鄂赣在长征路上	罗海曦/52
弘扬湘鄂赣苏区精神,不忘初心,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	
依靠人民	张珊珍/62
铜鼓幽居会议是湘鄂赣苏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滕久昕/66
弘扬湘鄂赣苏区精神的现实意义	涂俊彦/73
湘鄂赣苏区精神和中国梦	袁阳淮 王代芹/79
从红色歌谣解读湘鄂赣苏区精神	鲍利军/88
湘鄂赣英烈群与苏区红军精神	夏远生/98
鄂南暴动与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及其苏区精神	李城外	徐赐甲/111
湘鄂赣边游击区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和历史作用 ...	熊河水	张玉文/121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研究述评		包若然/129
党在赣北树立的一面武装斗争旗帜	常道林	陈柳罡/139
主体性·互动性·认同性——以早期湘鄂赣农民动员为中心的 考察	汤太林	张宏卿/147
湘鄂赣武宁苏区文化浅析	孔乐 余香文	程宗洛/157
论铜鼓是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创建的起点和中心区域		王现国/166
湘鄂赣省委、省苏移驻奉新		熊正秋/175
论朱毛率红一军团转战奉新的历史背景及意义		余赴京/179
龙门山突围地点、线路、兵力损失情况考析		洪江新/188
中共湘鄂赣省委领导下的高安武装斗争		易集明/197
湘鄂赣苏区医疗卫生工作的变革与融合——以铜鼓县苏为中心的 历史考察		朱红英/206
漫谈湘鄂赣苏区红色货币		翁梯敏/216
论湘鄂赣苏区时期铜鼓武装斗争的发展及经验	李中华	彭志中/224
铜鼓在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中的地位 and 作用		刘书琴/236
铜鼓为中国革命胜利做出的牺牲与贡献	邱立山	王现国/245
湘鄂赣边境客家对创建苏区有突出贡献		赖文峰/253
论萍乡在秋收起义和湘鄂赣苏区建立过程中的 作用和贡献	吴昌荣 罗晓安	易文浩/263
新余蒙山苏区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 特殊贡献	李立峰 潘昌	李凤平/269
试论萍乡苏区对湘鄂赣苏区的历史贡献	黎敏	文中友/277
浅谈湘鄂赣苏区无线电通信的创建和发展		张涛/283
试论湘鄂赣苏区的红军医院		古建林/293

谈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意义和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

地位与贡献	陈跃进/304
红五军台庄整编的意义和影响	周先来/310
群众路线是湘鄂赣苏区革命斗争发展的动力源泉	肖 卫/315
湘鄂赣苏区人民的斗争和牺牲及苏维埃政权逆境	
生存原因探析	欧阳乐义/324
浅论平江县人文地理经济条件对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影响	李醒狮/330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作风建设刍议	朱 平/336
红十 八军演变沿革	邓建龙/345
湘鄂赣根据地的妇女运动(1927—1934)	孙泽学 闫雪冰/351
通城秋暴与通城苏区的创建发展	黎 斌/361
湘鄂赣苏区经济社会建设探析	颜宏启 陈 军/371
湘鄂赣苏区妇女工作初探	刘 娟/379
具有鲜明革命性的湘鄂赣根据地货币设计艺术	吴继金/385
概论革命武装在鄂南地区发展壮大之路	刘彩云/392
浅议鄂东南苏区党员思想工作	黄海国/401
浅谈两湖秋收起义的部署、经过及意义	王 韦/408
革命视角下湘鄂赣苏区的教育建设	杨吉安/421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特点	光新伟/428
坚强的领导核心——试析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时期湘鄂赣省委	
对湘鄂赣边的领导	朱 常/440
论彭德怀在湘鄂赣苏区创建中的卓越贡献	邹文生/448
毛泽东在铜鼓领导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	林兆福/454
试述高咏生对湘鄂赣苏区的历史贡献	余 辉/464
从南昌起义到湘鄂赣特委——记郭亮后期的一段革命历程	邓建龙/468
彭德怀在湘鄂赣苏区的重要作用	杨衍秋/473



罗荣桓和通城暴动——兼论中国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通城县	
劳农政府	丰 铃/479
以彭德怀为代表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自我牺牲的	
大局意识	徐校雄 徐能武/487
追忆父亲郭子明	郭纯一/496
湘鄂赣军区副参谋长郭子明烈士生卒等问题的商榷	李 飞/508
赣粤边和湘鄂赣边三年游击战争比较研究	庄春贤/517
湘鄂赣苏区党和苏维埃政权关系初探	陈 安/527
秋收起义与湘鄂赣苏区的开创	汪鹏程/538
论井冈山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系	黄惠运/549
湘鄂赣苏区红军与长征	涂开荣/562
论湘鄂赣苏区与中央苏区的关系	王剑平 陈云芽/572
略述秋收起义与湘鄂赣苏区的创建	凌 辉/580
平江起义与湘鄂赣苏区创建和红军长征	洪和平/590
湘鄂赣红色旅游协同发展的研究与探讨	刘 洪/600
传承红色基因 加速苏区振兴——论述原湘鄂赣苏区科学定位抱团	
发展快速崛起路线图	熊晓原/608
做大湘鄂赣红色品牌 推进苏区旅游发展——关于发展湘鄂赣	
苏区红色旅游的几点看法	辛增友 徐小明/613
做好党史资政惠民工作 助推湘鄂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张足生/618
主动融入“中三角” 振兴原湘鄂赣苏区	巢瑞隆/624
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	
综述	宜春市党史地方志办公室 铜鼓县党史地方志办公室/631
后 记	编 者/639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奋力开创原湘鄂赣苏区发展新局面

谢亦森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在全党上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之际，由湘鄂赣三省党史部门和中共宜春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的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在这里隆重举行，这是一件好事、盛事。我作为曾经在湘鄂赣苏区重要组成部分的萍乡市、宜春市做过7年工作的一名党员干部，也为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感到高兴。在此，我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委托，向出席今天论坛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各位革命元勋后代、各位来宾以及新闻界的各位朋友，表示热烈欢迎，并致以崇高敬意！

从2010年至今，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家发改委和军事科学院等中央部委的亲切关心和大力支持下，经过湘鄂赣三省党史部门的共同努力，湘鄂赣苏区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三届，为深入挖掘湘鄂赣苏区红色历史资源，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大力弘扬苏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刚才，我们聆听了三省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等领导的讲话，我们深受启发，深受教育。借此机会，我谈三点认识和体会，供大家参考。

一、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需要更好地传承湘鄂赣苏区红色基因

刚刚闭幕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总结了我们党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弘扬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



新形势、新任务,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了更好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使我们党更好地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大危险”,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为进一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也为我们更好地传承湘鄂赣苏区红色基因,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湘鄂赣苏区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前期创建的全国六大苏区之一。1927年9月,毛泽东同志在铜鼓肖家祠领导发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并在文家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上决定起义部队撤往湘南农村,开始了向井冈山的伟大进军,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搭建了井冈山与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联系。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苏区后,又带回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湘鄂赣苏区斗争的历史,是我们党恢弘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湘鄂赣三省人民共同的光荣与骄傲。在湘鄂赣苏区的开创、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湘鄂赣苏区军民以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敢于牺牲的斗争精神、敢闯新路的创新精神、牺牲局部顾全大局的奉献精神,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牺牲和贡献。因此,本届论坛突出“牺牲·崛起”这一主题,既是对历史的呼应,也是现实的期盼。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唯有进一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大力弘扬湘鄂赣苏区精神和井冈山精神,才能以坚强的党性克服一切困难,保证湘鄂赣苏区振兴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推动各项事业更好更快发展。

回顾湘鄂赣苏区斗争史,我们还可以看到湘鄂赣苏区党的建设的辉煌一页。当时,随着苏区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党员队伍中思想作风方面出现了种种问题。为此,湘鄂赣苏区党的领导机关着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推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以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如:针对少数党员中出现的盲动主义、极端民主化、地方观念、派别斗争、腐化堕落和严重个人主义等,加强了政治形势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党的政治理论教育。此后还开展了整顿、纯洁党的组织,清洗党内投机分子,实行党员候补期制度,建立党的巡视制度,加强支部组织生活等一系列活动,使党组织的战斗力不断增强,促进了革命斗争蓬勃发展。

由此我们联想到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这

绝不是重复，而是一种必然，是我们党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具体体现。所以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举办湘鄂赣苏区论坛，就是要进一步运用好湘鄂赣苏区党史这本教科书，既汲取革命先辈“以天下为己任”“计利当计天下利”的精神力量，也汲取苏区党建中的宝贵经验，让红色基因在广大党员干部的血脉中更好地传承和延续，从而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把我们的党建设得更好。

二、深化研究宣传，进一步提高资政育人的质量和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紧抓好深化党史研究这个第一位的任务。”近年来，中央和湘、鄂、赣三省有关部门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加强湘鄂赣苏区研究，从资料收集到学术研究，从专题史研究到合作交流，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不少宝贵的成果，其中不少已经转化为服务苏区发展振兴的具体举措，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但是，我们要看到党史研究永无止境，拓展深化也永无止境。面对湘鄂赣三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更好地把握好角色定位，注重发挥湘鄂赣苏区论坛这一平台的重要作用，坚持把助推原湘鄂赣苏区振兴发展作为重中之重，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说实话、使实劲、用实招、求实效。

针对当前原湘鄂赣苏区振兴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我们要认真选取新课题、新视角，积极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写出新面貌。着眼于还原历史、再现历史，重视用新视角、新手段加大湘鄂赣苏区资料的征集力度，深入挖掘和灵活运用党史资料中蕴含的真实可信的历史细节，在基本著作、编年史、专门史和重大党史专题等方面多出创新成果，不断提升湘鄂赣苏区研究的整体水平。要突出加强红色基因传承，坚持把它作为一项基础性工程，与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相结合、与推动原湘鄂赣苏区发展振兴相结合、与加强党史工作队伍建设相结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苏区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要积极探索、广泛借鉴新方式、新载体和新途径，尤其要注重发挥动漫、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作用，大力宣传湘鄂赣苏区历史，讲好湘鄂赣苏区红色故事，使湘鄂赣苏区研究的成果“动”起来、“活”起来、“亮”起来。

湘鄂赣苏区研究成果的转化是一项长期工程，更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各级党委政府重视，社会各界参与，又要着眼提高湘鄂赣苏区论坛的长远效益，主动与相关部门做好精准对接工作，充分利用各种平台，真实反映老区人民的利益诉求，



积极建言献策,确保重大帮扶项目和各项优惠政策落到实处。坚持广泛开展党史国史教育,生动鲜活地讲好井冈山故事、长征故事、苏区故事,引导人们在缅怀革命先烈中坚定信念,在追寻党的奋斗足迹中激发斗志,让红色基因在中华大地继续传承。江西党史部门更要积极作为,主动发声,充分发挥资政功能,做好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的好助手,更好地服务于老区发展大局,以党史工作新成果服务党的建设新要求。

三、加强沟通合作,奋力开创推动原湘鄂赣苏区振兴发展的新局面

湘鄂赣苏区历史不仅同它的过去相联系,也同它的现在和未来相联系。只有对原湘鄂赣苏区人民昨天的奋斗有深切了解,才能更好地承担起今天的光荣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湘鄂赣三省干部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推进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但同时也要看到,从目前情况看,原湘鄂赣苏区范围内大都是革命老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社会城镇化水平较低,有的还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民生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发展振兴原湘鄂赣苏区,是推动三省区域同步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

近年来,党中央大力支持江西,国家政策助力江西,在继批复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规划之后,又批准江西开展“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和“赣江新区”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关心江西的发展,近年先后提出“新的希望、三个着力、四个坚持”的要求,并且明确提出要着力推动苏区老区发展,绝不能让苏区老区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掉队。江西人民不负期望,不辱使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省委省政府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决策,大力推进美丽中国“江西样板”建设、国企改革“江西样板”建设和扶贫攻坚“江西样板”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近期,我们即将召开省第十四次党代会,进一步推进“十三五”规划的实施,努力开创江西发展新局面。

湘鄂赣三省人文相亲、地缘相近、经济相连,党史资源十分丰富,合作前景广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三省军民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打破区域限制,团结协作,相互支持,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重大胜利。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进一步发

掘党史资源,在资政育人、传承红色基因、红色文化资源开发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服务好原湘鄂赣苏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不断创新交流合作方式,充分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特色和优势,三省联动,精准发力,谋求集群效应,以党史领域的积极合作推动湘鄂赣三省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的协调发展,努力开创湘、鄂、赣三省交流合作的新局面。

作为本次论坛主办方,我们江西的同志更要十分珍惜机会,认真学习汲取中央部委专家学者的智慧,认真学习湘鄂两省党史研究运用和改革发展的经验,把江西的工作做得更好。

同志们,学习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热潮已在全国掀起,新的进军号角已经吹响。站在原湘鄂赣苏区这块神圣而光荣的土地上,我们更要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不断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努力提升工作能力和水平,为推动和促进三省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关于深化苏区史研究的几个问题^①

蒋建农

摘 要:深化苏区史研究:第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推进;第二,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考察;第三,要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考察;第四,从苏区史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第五,开展各革命根据地的比较研究。当前苏区史研究面临新的契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重视党史研究,而且十分注重利用一些重要的历史节庆日,推进党史研究。因此,要避免固步自封,当务之急是整合资源,发挥湘鄂赣苏区论坛之类的机制和平台的作用,协同推进苏区史研究。

关键词:苏区史 协同推进 整合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85 周年纪念日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在铜鼓举行,这表达了老区人民对革命前辈当年所创造的革命业绩的无限敬仰。在这块最早响应八七会议的号召发动武装起义和开始创建中华苏维埃斗争的地方,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纪念当年的历史壮举,也表达了湘鄂赣老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好新的长征路,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国梦的坚定决心。在新的历史时期要进一步深化苏区史研究,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站在时代的高度去推进苏区史研究。时代的高度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可能是对我们党史事业特别偏爱,习近平总书记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就亲自分管党史工作。2010 年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下发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专门关于党史工作

^① 此文是作者 2016 年 11 月 6 日在第四届湘鄂赣苏区论坛主题发言的录音整理稿。

的中央文件,即《关于改进和加强新时期党史工作的意见》。在那次会议上习近平同志还作了重要讲话。在这之后,他围绕党史、国史问题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比如:在2013年1月在新进中央委员培训班的讲话、纪念抗战胜利69周年的讲话、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诞生60周年的讲话、纪念建党95周年的讲话、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的讲话等。此外,他还就领袖人物评价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观点。比如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邓小平诞辰110周年、陈云诞辰110周年和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而召开的座谈会上,他都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这些讲话中,他阐述了一系列的新思想和新论断,集中阐释了一种联系的、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和时代的历史观,大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对我们党史研究来说,既是方法论,也是一些具体的结论,是我们深入开展党史研究和宣传的重要思想指引。苏区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讲话精神,站在时代的高度,加强和推进对苏区史的研究。当年,湘鄂赣苏区和其他各个苏区一样,走的是一条中国式的,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今天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建设的道路。但是秉承的精神是一致的,那就是独立自主、实事求是和始终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构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这三大思想原则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他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因此,我们要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把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通过总结前人走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走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借鉴、提供一往直前的动力。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逻辑来考察。历史的发展走向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基本都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结果,都需要有一定的积淀和基础。大革命失败后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代表的各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就是如此。

毛泽东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红军的组成、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存在的地区,必须是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那些从未经过民主的政治训练、从未接受过工农影响的军队,例如阎锡山、张作霖的军队,此时便决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红军的成分来。”现在



各地都比较注重红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做了一些宣传,有不少的文艺作品,也有不少关于苏区研究的成果。但是,有的宣传文章和论著为追求可读性,一味地猎奇,讲传奇、故事比较多,内容脱离史实。我曾听过一位教授讲关于井冈山斗争的课,他过分地强调王佐、袁文才的作用。他说没有王佐、袁文才,毛泽东就无法落脚井冈山;那么失去了王佐、袁文才,红军就没有办法在井冈山立足。在座的很多都是苏区史研究的专家,不难判断他的那种观点是很片面的。在讲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队伍上井冈山问题时,那位老师也是强调偶然性,说毛泽东决定上井冈山是因为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让宋任穷同志带来一封信所致。真的这么简单吗?我觉得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参加秋收起义的一个团长王新亚,大革命时期和袁文才是拜把子兄弟,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发动之初就从他那里知道宁冈有袁文才领导的农民武装;秋收起义军向永新开进时,毛泽东在武汉主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时的一个学员叫陈慕平,他是袁文才手下一个重要骨干,他奉袁文才之命专程迎接毛泽东;抵达永新三湾的时候,李立后来回忆他就曾奉毛泽东命令给袁文才送过信。可见联系的渠道是多个而不是只有一个。再者,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领导的而不是由江西省委领导的,因此,汪泽楷让宋任穷同志带的信不具有上级指示的性质。从毛泽东个人的情况来说,大革命时期他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明确地把废除封建地主统治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最基本内容,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其中他提出“一切权利归农会”,这实际有建立新型农村政权的意思;提出“必须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提出“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是一些非常宝贵的思想火花,是毛泽东对农村革命的最初探索。可惜,这一探索由于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犯“右”倾错误,在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没有实现。所以毛泽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上说他关于必须站在农民前头领导农民的观点,“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我的意见因他们说是不通,于是也就没有成立。”由此,他得出“以后上级机关应尽心听下级的报告,然后才能由不革命的转入革命的”结论。正因为他有这样一种思想基础,大革命失败之后,瞿秋白让他到上海去,到中央工作,他不

去,他要下湖上山,所以他在打长沙遇挫后选择去井冈山落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可见,毛泽东率秋收起义的队伍上井冈山不是一种偶然,他是有思想基础的。他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红色政权理论,其核心内容是“三位一体”。所谓“三位一体”就是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这和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所阐述的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大革命后期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和思想探索,就没有秋收暴动失败后毛泽东率队伍上井冈山的历史抉择。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一定要从历史发展的逻辑去看历史,而不是过分地强调偶然性和戏剧性。那样的话,高等学校的教授不就沦为井冈山的导游了吗?

再如:关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究竟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时,还是在第四次反“围剿”胜利时,抑或是在遵义会议上形成的,学术界观点不一。我觉得如果把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斗争实践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就不难划分出若干阶段,并得出一些相应的概念。如: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反“围剿”战争的战略战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毛泽东军事思想。我个人认为,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是井冈山时期形成的,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是第三次反“围剿”时形成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是遵义会议后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的时间,还是应该以1936年10月毛泽东在红军大学发表《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的讲课为标志,这可能更恰当些。总之,孤立地看某一历史现象,往往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总是将其与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历史联系起来,与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的历史联系起来,与中国近代170多年的历史联系起来,甚至与社会主义学说500多年的发展历程联系起来。他运用的是马克思主义联系的发展的唯物史观。这是我们在研究苏区史时必须学习和运用的。

第三,要从历史发展的空间来考察。每一个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都有其地缘因素。现在各地开发红色旅游资源的时候,大家纷争不已。我们一些党史工作者也推波助澜。比如:鄂豫皖根据地,那是一块有着共同的地缘因素的革命老区。现在湖北红安的同志说许世友的家乡当年属于红安,现在划到河南新县,因此计算各县将军数的时候,许世友上将应该算到红安;河南商城和安徽金寨也争,河南的同志说洪学智自己填表就说他是商城人,现在怎么可以因区划变更将其出生地



划入金寨而说他是金寨人呢？与此相关，有些县的党史工作者脱离历史实际，不恰当地强调他所在县在创建鄂豫皖苏区中的作用。如果都这么各说各的，县与县、省与省出版的书籍互相矛盾。那么，我们的苏区史研究就会支离破碎。这种现象在前几年申报苏区县的时候，尤为突出。一些学者不惜歪曲历史，突出自己所在县市当年在中央苏区时的地位，贬低邻近地区的作用，出版和发表了许多似是而非的“学术作品”。这对苏区史研究干扰很大。事实上，鄂豫皖地区是因大别山纵横其间而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形成了相同的经济、相同的文化和相同的习俗，以及盘根错节的血缘和宗亲关系，这种状况由来已久。不能因为今天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我们就非要把这种共同的历史空间割裂开来，各说各的。不管前因、不管后果，把空间也彻底撇开，只突出某个县、某个市。

再如：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的研究，也存在着刻意渲染两个根据地之间矛盾的做法和故意为肃反错误文过饰非的行为。事实上，这两块根据地都处于少数民族和汉族发达地区中间地带，有着共同地缘和宗亲关系。陕甘边根据地的发展离不开陕北根据地的支持与帮助，陕北根据地的发展同样也离不开陕甘边根据地的帮助与支持。由于反动统治势力的分割，在一个时期里，这两个根据地相对独立地平行发展；虽然它们与上级的领导关系不一样，一个隶属于中共陕西省委，一个由中共北方局领导；虽然双方在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的方式、方法上不尽相同，甚至在其完全融为一体过程中，特别是在受到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教条主义干扰、危害的情况下，在一部分同志中间甚至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和矛盾；但是在总的方面，它们都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的，都是按照党的八七会议确定的总方针开展斗争的；这两块根据地的创建者和参与者，有着共同的奋斗理想和斗争目标，有共同的地域关系和生活环境，自打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伊始，就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根据地在干部、人员方面互有交差和补充；在发展指向和区域上，既各有侧重，又经常不谋而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双方不仅在战略上互为依托和支撑，而且在战役、战术方面的配合更是一种常态。即使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肃反，虽然主要矛头指向了陕甘边根据地的领袖和骨干，但是陕北根据地红二十七军的领导人，也一同被撤职、调离，受到打击和歧视。总之，双方这种亲密无间、共同奋斗的关系，是其最终能够

融为一体共同组成陕甘根据地的根本条件。因此,我们说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不只是陕甘边,还包括陕北;同样,我们说八路军挺进抗日前线的“出发点”也不只是陕北,不能撇开原来的陕甘边根据地。所以,我们研究苏区史不能人为地撕裂历史上早已形成的地缘空间,而应该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和深化苏区史研究。

第四,从苏区史所处的时代背景来考察。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中国社会性质有什么变化?与此相关,中国革命的任务是什么?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些问题在当年曾引起国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争论。在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的两派意见争论不已;在国统区进行了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国史大论战、中国农村问题的三大论战,包括共产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等各党派和各界人士都踊跃地参加,论战前后持续三年之久;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围绕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问题,也对中国革命的性质等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八七会议确定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党的六大明确了中国仍然处于民主革命阶段,中国革命的任务仍然是反帝反封建。这些都符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的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任务的实际。但是也有不和谐的,那就是应该由谁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所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当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恰恰含混不清。民族资产阶级当时叫中产阶级,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是不是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了?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大革命失败之后他们还是不是革命的团结和依靠对象呢?对此,党内的认识有错误。再者,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不是和中产阶级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呢?的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而当年的错误恰恰就是在于混淆了他们究竟是团结的对象,还是革命的对象问题。于是就把中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都作为革命的敌人,一同打击。当时在各个苏区普遍地开展反第三党、反改组派的斗争。第三党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政党,是国民党左派邓演达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他们始终高举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邓演达将其发展为平民革命的理论),坚持进行反对蒋介石和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改组派首领是汪精卫和陈公博,臭名昭著。但是改组派的旗号是要恢复1924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改组精神,它和第三党一样也是反蒋的,其实质



上是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党派。在改组派中有不少国民党的左派,比如:何香凝和许德珩(新中国成立后都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就曾经参加过改组派,改组派中的不少人也受到蒋介石的追捕和暗杀。但是,当年我们却把他们都作为敌人对待。这就混淆了革命的对象,这是各苏区普遍出现肃反扩大化错误的主要原因。

肃反问题是苏区史研究的热点,也是坊间一直广为关注的问题。对于肃反扩大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学术界认识不一。我认为既有革命斗争形势严酷,在敌我力量悬殊的白色恐怖下,我们内部有些立场不坚定的人反水;又有蒋介石和其他反动势力派人进行策反或打入我们内部的现象;还有我们队伍中的土客籍矛盾、山头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不良影响;也有盲目学习、照搬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一些不恰当指挥的因素,特别是在几次由左倾教条主义者把持党中央领导权的时期,还存在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问题。上述五种情况都有许多活生生的例子,留下血的教训。而这些血的教训的一再发生,反过来增强了人们对肃反必要性的认识和对肃反扩大化现象的宽容。当时在各个苏区都设置有多个层次的政治保卫局,红军各军团中的保卫局局长级别很高,与政治部主任、参谋长平级。我认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主要原因,应该是我们对阶级力量的分析不正确,也就是在依靠谁、团结谁和反对谁这一阶级路线问题上出现偏差,把在民主革命阶段本来应作为团结和依靠力量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上层小资产阶级,作为打击的对象,甚至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这才导致各苏区普遍出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由于存在上述主客观的因素,因此也可以说,肃反扩大化的恶果尽管让人痛心疾首,但势在难免。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志呢?肃反扩大化错误危害时间很长,几乎延续整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犯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同志为数很多,包括一些党的领袖人物,还不乏一些著名的革命烈士。各自犯此错误的原因也比较复杂。在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初期,主要是受认识水平的局限;也有一些是因为中央的路线错了,他们因贯彻中央路线而犯错误,像派到湘鄂赣根据地的林瑞笙、闽浙赣苏区的万永诚、鄂豫皖苏区的沈泽民和派到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成员顾作霖等,都是奉命去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的王明路线,后来都为革命献